

昆曲有一出常演的折子戏，名叫《虎囊弹·山亭》，演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为避官府捉拿去五台山文殊院为僧，却耐不得山中清苦，私自下山，在半山亭上抢酒豪饮，大醉而归。明明是梁山人物和水浒故事，却与“虎囊弹”何干，那“虎囊弹”又是何物？

原来又是个《水浒传》的衍化版。《水浒传》问世后，借此书之砖瓦，砌自家之门墙的很多，最著名的就是《金瓶梅》。《虎囊弹》亦是，却不是小说而是戏。戏的前半照搬原著，后半开始发挥。话说那个被鲁达所救的金翠莲，后来嫁了赵员外为妾，生活美满。但好景不长，赵员外得罪恶霸被陷入狱，性命只在旦夕，金翠莲为救老公，在衙门口长跪鸣冤。中军牛健见了，厉声喝道，按衙门的规矩，告状人须先被吊在高杆上，受虎囊弹一百下，若还有命，方能允告。金翠莲毫无惧色，一口答应。牛健倒吓了一跳，原以为此女

## 起舞行歌最得神

胡晓军

所告无非家长里短，不外鸡毛蒜皮，拿虎囊弹吓她一吓便可，不想结果如此。牛健由此断定，此女实有重大冤情，不仅免刑，而且设法助其告状。经过一番周折，赵员外终于洗冤脱狱。

原来虎囊弹是一种极厉害的刑具。不过它的形状、大小及用法，牛健没

说，作者没写，加上任何文献俱无记载，以至于有人猜为作者的杜撰。虽然如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一百虎囊弹定是非同小可，其威力绝不亚于孟州管营的一百杀威棒。讨打杀威棒的是武二郎，愿受虎囊弹的却是弱女子，难怪牛健立时改了主意。可惜《虎囊弹》全本早已失传，只有这折《山亭》演到如今。看来文章之存废，戏曲之传轶，除了天眷或天弃，便是才高或才低的缘故了。

话说鲁达虽削了须发，立了法名，毕竟本性难移。《水浒传》写他白天不念经，晚上不坐禅，困了倒头便睡，鼾声震天。净手不去茅房，只在佛殿后撒尿拉屎，臭气熏人。和尚们纷纷皱眉，双手合十，口称“善哉”。智深听了喝道，什么龔哉，洒家团鱼也吃！和尚们又道“苦也”，智深又道，团鱼肥甜好吃，哪得苦也？和尚们没法，只得向智真長老告状，長老微微一笑，说智深将来证果非凡，你等皆不如他。

智深在文殊院里呆了数月，每日青菜萝卜，每顿白饭稀粥，口中早已淡出个鸟来。一日走出寺外，行至半山，正思量向何处吃碗酒去，恰见有个汉子挑着一副担桶，在亭中歇脚擦汗。《水浒传》写他问那汉子，桶里甚么东西？汉子道是好酒。智深再问多少钱一桶？汉子道，我这酒挑上山去，只卖与那些做工的吃。長老已有法旨，若卖与你等和尚吃了，要追了本钱，赶出屋去。智深道真个不

### 书法

姚竹

卖？汉子道，杀了我也不卖！智深道，酒家也不杀你，只问你买酒吃！汉子见不是头，挑了担桶便走。智深赶上亭外，双手拿住扁担，只一脚，汉子捂着裆，就做一堆蹲在了地下。智深拿了旋子，开了桶盖，只顾舀吃，无移时吃了一桶，道那汉子，明日

来寺里讨钱。汉子方才疼止，又怕長老得知，坏了衣服，忍气吞声，拾了旋子，把酒分两半桶挑了，飞也似下山去了。

《山亭》大致就是这么演的。区别是智深在这说里只吃了一桶酒，在戏里却吃光了两桶酒。戏的情节简单如此，又与小说相仿如此，按理说人们只消坐在家里看书即可，又何必劳步动

车，去剧场看戏呢？原来看戏与看书看影视剧，很不一样。戏的故事不过是一个壳，演的歌舞倒成了一枚核。会看戏的人，不为看故事，而为看表演，赏其技艺，得其神韵。这与喝不求解渴的茶，行不求到达的路是同等道理，不但是生活之必需，更是境界之高致。《山亭》由净丑二角应工，净角高大魁梧，丑角矮小灵活，若是二人技艺精湛，配合默契，往往妙到毫巅，令人叫绝。最后智深酒兴大发，净角更摆出全套罗汉十八式，金鸡独立、朝天蹬、罗汉叠，招式超难，有华美的雕塑感。由此《山亭》极对观众的脾胃，曹雪芹曾借薛宝钗之口夸其“排场又好，词藻更妙，铿锵顿挫”，却只字未提虎囊弹之事，想必那时全剧已经

不传。大浪淘沙，往往淘洗过后才见金珠，我觉得



与其说《虎囊弹》只存下《山亭》一折戏，倒不如说《山亭》保住了《虎囊弹》一个名。

我还觉得昆曲所演，要比小说所写更精彩。论起这部“第五才子书”的文笔，固然好到令人浮想联翩，毕竟是歌舞来得更亲切更直接一些。更要紧的是，区区这一折戏，便将整部书对智深的刻画与评价全都演了出来——他虽把汉子的两桶酒都吃完了，却以豪爽的天性打动了汉子，两人嗔气尽消，言归于好，快快活活，各走各路。智深的真性就这样被昆曲活生生地发扬了出来，智深的归宿也就这样被昆曲悠悠地暗示了出来。《水浒传》写他宿于杭州六合寺，当晚听得钱塘江潮轰鸣，想起智真长老的偈语“听潮而圆，见信而寂”，一笑坐化，临终前写下“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的自评。而《水浒传》的赞词，却把“杀人放火”释为“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终成正果。昆曲净角须既演出他的金刚身和霹雳手，又演出他的菩萨心和光明性，方不悖了金圣叹所下的一百单八将之“上上人物”的评语。

未发虎囊究不存，独留水浒传中人。天生一个花和尚，起舞行歌最得神。（调寄《浪淘沙》）

性灵说实际上是一种诗说，近人所列性灵派三大家袁枚、赵翼、张问陶皆出自清乾嘉年间，不算太远。其中，袁枚的“性灵”说，强调性情是诗歌的第一要素，“性情之外本无诗”。而这种性情要表现出诗人独特的个性，“作诗不可无我”（《随园诗话》卷七）；明朝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是“性灵派”大家，主张“师心自用，独抒性灵”。他在《雪涛阁集序》中所提出的“穷新极变”的原则和前、后七子的蹈袭前人，从创作原则上看是根本不同的。而公安派“求变立新”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性灵说的学术基础上的。因为诗文都是性灵的表现，而性灵是人所自有的。应该说，“公安派”的主张，在晚明文学的思潮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且形成一种审美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袁宏道无疑受到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更和王阳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对说教式的程朱理学的修正这个学术背景不无关系。由于他本人对禅学的精通，并从中悟得“吾心本自具足”“随缘自在”的观念、以为依据他缘的助力都非性灵之道。另外，“性灵说”的艺术实践者，不乏“王学”的拥趸，比如徐渭等。

追根溯源，“性灵说”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重要主张有其源远流长和跌宕起伏的历史脉络。最早使用“性灵”概念品评诗文的是南朝钟嵘的《诗品》，突出诗歌“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等特性，强调“直寻”和“自然英旨”之美。他赞扬阮籍的诗源出《小雅》，无雕虫之巧，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后来“性灵说”的主张与之是比较接近的。

如果进一步追溯，先秦两汉时的“性情说”应属“性灵说”的起源，它们之间既有内在关联，又有一定区别。

那么，究竟什么是“性灵”呢？性灵之所谓“性”，应指“性情”，这属于感性层面的心理范畴；所谓“灵”，原意为“巫”，后引申为人的杰出才能。从词意上理解，应指创作者同时兼具本真的性情和杰出的才能，包含先天的才气、心性和后天的学养、修为两个方面。

从风格上讲，真挚、新奇、淡除教化、词高意远、汉魏风骨、慷慨悲歌都是性灵的艺术呈现，惟其如此，容不得虚假矫揉和过度修饰。诚如晋陆机《文赋》云：“仁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懷懷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藻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一副士子的真情怀抱和满腹华彩跃然纸上，格局是大我的，是汪洋恣肆、气韵贯通、不拘一格的。刘勰云“性灵豁匠，文章奥府”、颜之推云“标举兴会，发引性灵”、萧子显云“图写性情，各任怀抱”、萧纲云“性情卓绝，新致英奇”等文学主张，可谓“风云际会”、蔚为大观。

其实，大力提倡性灵、主张诗歌表现性情的代不乏人，除以上提到的，还有唐白居易、李商隐、司空图；宋杨万里；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钱谦益等，都反对形式主义、一味拟古和僵化程式的诗风，强调出新意、去陈言，追求个性化；继承先秦屈（原）宋（玉）的诗魂风骨和发扬汉魏文人那种清新刚健的文风。

“性灵说”是针对文心与人心裂变的一剂良药，崇尚真我、注重对“人”的提升；提倡生命的自觉和表达的自由。落实到具体创作中，则是性情、才情和个性面目的交融共振，以期在创作中达致“抑扬词气、思极人文、风雅兴寄、意蕴含吐”的饱满状态和自在语境，就精神实质而言，无疑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 川沙老街古韵浓

郭树清

从市区乘坐申川专线车，穿越杨浦大桥，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便可到达浦东川沙古镇。

走进巷口，踏着光滑、古老的青石板，向老街深处走去，犹如走进悠悠的历史长廊。一排排保存完整的明清古民居静静地矗立着，触目皆是做工精细，图案清晰，栩栩如生的石雕、砖雕和木雕，以及透着古意的祠堂、书院、牌坊、庙宇、宗谱，还有那古老的门罩、天井、房梁、漏窗……都仿佛在告诉这曾经的史中沧桑，古镇的精美与韵味尽在不言之中。

古镇内河浜纵横交错，水面上碧波荡漾，两岸的堤岸上绿树成荫，岸边贴水而建的亭台、连廊曲折折，有凌波的感觉。特别是星罗棋布的桥梁似乎在默默地穿越着老街的前世今生，成为古镇的另一亮色。古镇老街两旁错落有致的粉墙黛瓦皆镶嵌在古色古香的巷巷民居之中，整条街面的商铺和木板楼房鳞次栉比，其中有不少还保留着旧时的老字号店招和原貌。

登上古老的城墙，这里茂林修竹，古木参天，却依然焕发着葱茏的风姿，显现当年的恢宏和威严。据史料记载，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朝廷从里人乔镗、王潭之请，筑筑川沙城。九月始筑，十一月竣工。城周围四里，高二丈八尺，阔三丈有余。门四，堞楼如之，东门名镇海，西门名太平，南门名迎瑞，北门名拱极，月城四，雉堞三百七十二垛，炮台十二座，吊桥四，濠阔一十二丈，深一丈五尺。如今，历经461年沧桑岁月，仅存城厢镇小学东南遗址城墙一角。古城墙上魁星阁高高耸立，飞檐翘角，无言叙述着川沙人崇文重教的儒雅风尚。还有烽火台、古炮、诗碑等遗迹，气度不凡，典雅凝重，散发着中华民族的古典审美情状。

古城墙不远处的“内史第”黄炎培故居仍保存完好。现在“内史第”可谓大名鼎鼎，曾经在中国近现代一些叱咤风云的历史名人在此生活过。“内史第”又名沈家大院，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占地面积34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00多平方米，系清代著名金石学家、书画鉴赏家沈树鏞（1832—1873）祖上建于清道光年间。这座有着170余年历史的宅第英才辈出：其中包括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

者、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1878年诞生于此宅第三进院内。宋耀如与倪桂珍夫妇携子女于1890年至1904年在此生活了10余年，宋氏姐弟在此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因此宋庆龄和宋美龄直至晚年，她们的讲话还带有浓郁甜润的浦东乡音。有人为内史第宋庆龄诞生地题联：“春秋十度凭飞去，乡音一口认归来。”

据称，宋庆龄在1893年诞生于“内史第”第一进西侧沿街房内，著名的翻译家傅雷曾租住于此。

有人说，古建筑、古文化、古树名木、乡贤达人无疑是一座城市的乡魂，川沙古镇有那么多的历史承载，不正是这座城市的魂么？

## 七律二首

姚国仪

### 黄菊花

霜浓始觉意绸缪，嫩蕊初黄似带羞。  
南院新泥泥旧迹，东篱旧叶长新秋。  
争妍或许供人赏，落寞谁曾伴尔愁。  
且放苍山茂林处，一衣金甲竞风流。

### 红枫

几经霜冻始精神，别样丰姿更率真。  
守得山林甘寂寞，立于天地不沉沦。  
逊修竹遍千重岭，胜艳花争二月春。  
纵使飘零犹绚烂，欲题红叶寄何人。

行驶在上海中心城区的11路电车，起点和终点站都叫“环城圆路”，是一条循环公交线路，站点多以老城厢命名， “环城圆路”四个字虽然是在大多数地图上都找不到的路名，却有着别样意义。要想领略上海老城厢七百年风貌，沿着11路的运行轨迹就可以。

1291年对上海而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根据资料记载，那年，上海由“镇”升格为“县”，并置上海市舶司专管海上贸易。尽管古代中国“县”级城市可以筑城，但上海的城墙一直要到二百多年后的1553年才拔地而起。登上大境阁那沧桑厚重的城墙，凝望眼前车水马龙的街道，才能真切感受到传统对现代的无私接纳与包容。最初的上海城墙有六座城门（后来增至十座）。城墙以内叫做“城”。但城的

辐射效应还会体现在城乡结合部。在靠近城门的城外一带，经济活动频繁、人口逐渐增多，慢慢成为城的衍生地带。于是，人们便用“城厢”一词泛指城内和城外比较繁华的地区。上海老城厢的主体位于今天中华路、人民路围成的椭圆形区域及其东南一带。明末清初，繁忙的水上交通网络与各类贸易使上海老城厢得到了“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

口述项目开始之前，我们一张张翻看历史上的上海地图。城北的荒草变成了通衢道，租界飞速崛起。反观老城厢，小刀会起义等引发的战乱导致城区的破坏、经济的衰落，大量人口流向租界。十里洋场逐渐取代老城厢，成为整个上海的象征。老城厢人也曾奋起直追，城墙拆除

了，壕沟填平了，弹格路变成了水泥地，老书院变成了新学堂，各式游乐场、电影院人头攒动，但这里的时光总是比环城圆路外要慢一些。我们走走在文庙路，与受访老人一道追念他们的一生。初为少年便在文庙的旧书摊浏览着精美插画的小人书；长发系腰后走进老弄堂的菜饭店品味着黄豆汤与腐乳肉的浓厚；步履蹒跚却依旧要在酒家常坐，温一碗花雕酒，嚼嚼茴香豆。“不管这里变成哪能样子，吾家吾根就在这里。”这是一位老城厢人的肺腑之言，也像极了老城厢坚守上海传统文化的誓言。

豫园是此行的终点。熙熙攘攘的人群将我们推向九曲桥。文保专家告诉我们，老城厢文物保护的历史也经历过九曲十八弯。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老城厢的

历史价值才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以豫园、文庙为代表的古建筑修缮改建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还原历史又充满时代气息的老城厢，为上海旅游业的发展添砖加瓦。习主席曾提出：“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这为老城厢今后的繁荣指明了方向。

老城厢七百年的变迁史，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峥嵘变化的缩影。历经这次短暂的旅途，我越发执着于老城厢的往事，越发热爱上海。无论是承载七百年兴荣的老城厢、百年来风云际会的十里洋场，亦或是今日蒸蒸日上的浦江两岸……他们手拉手共同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下期刊登一组《对话艺术》，责任编辑：郭影。

